

敢言說「不」的殉道者（下）

第二十世紀的殉道聖人及神學省思

郭偉基

本文作者分三篇介紹殉道聖人的事蹟，分別有第三世紀四位殉道者、第十六世紀的兩位英國殉道者、第二十世紀在中國義和團及波蘭集中營的殉道者。作者在其前後的導言和神學反思中，點出了殉道者見證基督信仰的精神及對今日教會的提醒，深值參考。本文上篇載於本刊 221 期 327~355 頁，中篇載於本刊 222 期 521~548 頁。

一、義和團運動中的殉道者及「堅守信仰者」李士恆¹

在中國天主教史中，義和團運動是一件最嚴重的民教衝突事件之一，教友死亡人數達兩至三萬人，地域跨越華北數十省，並因此引發八國聯軍入侵，及後來天價的庚子賠款。據研究顯示，在山西太原的殉道者特別多，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信眾的取向使然。他們在面對殺身之劫時，本來有很多選擇，但最終卻選取了放棄自己生命的意願。他們將命運交到上主的手

¹ 本段主要取材自：韓承良，《忠烈英魂：方濟會中華殉道聖人小傳》（香港：方濟會，2000）；劉淑珍，《風雨彩虹》（香港：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2000）；林瑞琪，〈義和團事件中太原市致命者特多的背景原因〉，收錄 Angelo S. Lazzarotto 等合著，《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台北：輔仁大學，2004）。

中，最終以殉道致命的方式結束了現世的生活。太原之所以喪失大量生命，源於山西人的性格與方濟會的求仁得仁心態在歷史中巧妙的結合，兩者或欠其一均不能成事。太原的教友願意殉道者，可以隨時獻出頭顱；不願意殉道者，可以據地頑抗。²

正如前述，殉道者不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0 年 10 月 1 日將 120 位殉道者宣聖為中華殉道聖人，其中包括在義和團運動中成為殉道聖人的 86 位。限於篇幅，這裡只選取聖雷體仁神父（S. Elia Facchini, OFM）、兩位平信徒（李忠義伯多祿及其兄李瑪弟亞）及瑪利亞方濟各會（FMM）的七位致命修女跟讀者分享。值得注意的是，李忠義及李瑪弟亞乃香港教區李毓明神父的祖父和祖伯父。當時一起殉道的本應還有李毓明神父的父親李士恆，李士恆殉道未果，大難不死而受重傷，並最終成為「堅守信仰者」（Confessor）。雖然李忠義及李瑪弟亞並未被宣聖為聖人，但李士恆日後向後人親口講述了當年殉道者英勇就義的經過，包括他的父親、李忠義及伯父李瑪弟亞如何殉道。

（一）聖雷體仁神父（S. Elia Facchini, 1839~1900）

雷神父 1839 年 7 月 2 日出生於意大利雷諾（Reno Centese）。1858 年 7 月 1 日，年輕的雷神父進入黎米尼（Remini）的方濟初學院。晉升神父後，他於 1867 年 4 月 29 日到達了傳教的目的地山西省會太原城。在 23 年的傳教生活中，他曾在堂區工作，也擔任過方濟會院的院長和大修院的院長。1893 年 9 月他被任

² 林瑞琪，〈義和團事件中太原市致命者特多的背景原因〉，369 頁。

命為洞兒溝方濟會院第一任院長。1900年他又被調回太原城的修院工作。就在這修院工作期間，他一直渴望為主殉道的機會來了。在韓承良神父為紀念太原義和團事件中的方濟會致命者而編著的《忠烈英魂》一書中，提及了雷神父殉道前的心情：

他（聖雷體仁）知道已到了大難的前夕。其實這也是他所希望的日子。因為他曾向修士和其他弟兄們表示過：「我前來中國的原因，除了傳教之外，是希望能有為主致命的機會。可是自從我來到太原後，一切正常順利，也沒有太大困難。而且太平無事，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莫非我要死在我的床上不成？可惜！」這的確是出自雷神父對天主慷慨大方的熱愛心靈的話。因此不久後，當教難即要開始時，大家都在心驚膽戰地等待著大難來臨，惟有我們的雷神父泰然處之，若無其事。……他甚至高興地說：「如果人們要置我於死地，我會很快地上升天堂去享福。現在我已經老了，身體也衰弱了，為什麼我還要逃走？如果我能為信仰致命，我將非常感謝上主的大恩。啊，巴不得他們將我殺死，如此會很快地結束一切，也很快到天堂去。」³

當教難真正來臨時，主教本來已命令雷神父乘車逃命，雷神父雖聽命，但這卻是違反他個人的意願，他心靈的深處感到為難。然而，「當車子開到了城北門，被守門士兵所查獲，立即送至曲陽縣衙門。該處知縣白昶將雷神父押於禮房，迨至半夜

³ 韓承良，《忠烈英魂》，54頁。

將他送回聖堂中。到了 7 月 5 日，雷神父終於偕同二位主教，即艾士傑主教（S. Gregorius Grassi, OFM）和富格勒主教（S. Francisus Fogolla, OFM）同時被捕，囚於鐵路公所。同月九日午後，知縣假裝翻譯洋文書信，將雷神父轉送至縣府，隨行者為李、王兩位修生。先將雷神父押進班房，加上手銬，下入監牢中。同日下午四時左右被送至山西巡撫毓賢的衙門內，當面交給巡撫。當雷神父被押解時，由知縣至巡撫路途中，有教友見雷神父仍然從容不迫地，一路上手中拿著他一生慣用的蒲草扇，手上雖然帶著手銬，卻仍然是隨走隨搧，面色怡然自得，他毫無驚懼之情。到了轅門時，他見滿地是屍體和血跡，他知道其他主教、神父、修女、修士和教友等，已經為主流血升天了。他立即笑逐顏開地仰面向天，大聲喊說：『升天堂了！』接著便英勇地為主潮流血致命死了。」⁴

（二）平信徒殉道者李忠義及李瑪弟亞

在 1900 年義和團所發動的庚子教難中，山西省太原城共有 69 位為主殉道，當中有不少平信徒，包含來自歷代虔誠的教友家庭。李姓家庭有兩位殉道者，即李忠義及李瑪弟亞。他倆是香港教區李毓明神父的祖父和祖伯父。

據目擊者報導，山西太原城曾發生三次致命事件。第一次：7 月 9 日，兩位主教、兩位神父、一位方濟會修士、五位中國修士、七位修女、九位教友，首先在太原市天平巷的碑亭集合，

⁴ 韓承良，《忠烈英魂》，55 頁。

然後被押到撫台衙門前致命。第二次：7月12日，兩位女教友，即72歲的李亞納及45歲的武方濟加，在上肖牆街桑棉局大院內致命。第三次：7月14日，卅九位教友在大北門街東頭道巷致命。李毓明神父的父親李士恆和母親賈羅撒均參與了其中第二及第三次致命事件。

簡單交代李士恆的家庭背景。李士恆的父親李忠義原先祖籍山西省平遙縣，他在平遙縣城西南的七洞村成長，當時村中只有忠義一家信奉天主教。忠義的祖父李蝦吉在世時，家境富裕，在平遙城內設有銀號，並樂善好施，對窮人常加援手。蝦吉翁的銀號傳到忠義的父親泰榮時，便將銀號事業出讓給別人，自己到了平遙縣城天主堂幫忙神父做傳教工作。後來，李家遇上了1877年（光緒三年）的山西大旱，顆粒不收。忠義的父親於是率領全家老小，步行二百里路到太原城，暫住在北門街天主堂的對面，名叫香坊院的後面。這裡是天主堂的房屋，後來改為天主教公教進行會的會議廳。忠義公製鞋，暇時便給人修鞋。後來李家遷往頭道鄉，距離最終致命地點不遠。⁵

在林瑞琪編的《中華大地的榮耀：慶祝一百二十位中國殉道者榮列聖品》一書中，李毓明神父提及祖父李忠義及祖伯父李瑪弟亞的殉道過程，及父親李士恆的見證：

繼1900年7月9日艾士傑主教及富格辣主教等廿六人在山西撫台衙門前為主教殉道後，7月14日山西巡撫毓賢

⁵ 林瑞琪編，《中華大地的榮耀：慶祝一百二十位中國殉道者榮列聖品》（香港：聖神研究中心，2001），84頁。

又下令：『凡不肯叛教的男教友，都到北門街東頭道巷集合。』教友們聽到這命令後，人人心情激動，個個滿心歡喜，他們都沿著自家的地方前進，一路上當然是彼此互勉，相互鼓勵；忠義更不例外，當他一聽到這命令後，便給自己的三個較大的兒子——士顏、士宦和十二歲的士恆說：

『走！我們去升天堂吧！』於是便和家人告別，走向致命的地方。……父親前邊走，兒子後邊隨，走過了幾條小巷，當轉彎的時候，士宦趁父親不察覺，悄悄地溜走了。後來他想起當日的事非常後悔，一輩子過著補贖的生活，於1937年安然逝世。忠義和他的兒子們來到致命的地點，這時已來了不少教友，相識的也不少，地方小而人多，每個人只好各自找自己的位置，然後安祥地跪下，口中不停地唸各人所喜歡唸的經。按當時風俗，男人都留長辮，爲了使劊子手殺戮方便，所以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辮子，由頭上向前額拿下來，握在手中，同時彎下腰，把自己的脖子盡量挺直，給大刀留不便利的餘地。他們從早上來到這兒，等了三個多鐘頭，還不見劊子手，這不能不使他們著急，唯恐不能得到殉道這福份。因此不時往後看，是不是來了。

大約快到中午的時候，一隊劊子手隨著兵頭跑來了，這時唸經的聲音越高，脖子也挺得越直。劊子手們在「殺」的命令下，便揮刀亂砍。忠義和士顏跪的地方是在廣場的通道處，所以很容易地頭和身體便分開了；士恆跪的地方剛好有一塊台階式的大石，當劊子手的刀一落到士恆脖子

上，刀便著了石，因此只砍斷了一股筋肉，氣管並未受損。因為教友多，所以劊子手也不管是不是每個人的頭顱都離開了身體，這便造成了士恆不能和他的父兄立時享見天主聖容的福氣。劊子手還未殺到十分之一的人，領隊者便下令停止殺戮，收隊回府。其他未得殉道的教友大失所望，便攔住劊子手，要求致命。但因命令既出，兵等不敢下刀，教友們只有相對而哭。總計這次殉道者共卅九人，李忠義和李士顏是其中的二人；另外還有殉道未果受重傷者三人，即李士恆、趙二牛和胡銀虎。⁶

及後，李士恆回憶說：「當劊子手的刀落在我的脖子上時，我只覺涼了一下，就甚麼也不知覺了，我在血泊中躺了兩天兩夜」，不知流了多少血，直到第三天（7月16日）上午，有一外教人由此經過，在眾死者中見有一人輕輕地抽縮，走前一看是相識的士恆，他只聽到士恆輕微微的聲音「渴」。這位好心人知道士恆由於流血太多而渴極了，便找了一塊碎碗片，從剛下過雨的地面坑凹處舀了一點穢雨水滋潤士恆的嘴唇，便立即跑去告訴他的母親，士恆被母親設法抬回去，由於官府不准在原地居住，便臨時住到離城十里遠的澗河村。士恆的刀傷沒有條件敷藥、更沒有錢打針吃藥，祖母只是把他託靠給天主，任隨天主的聖意安排。刀口不僅沒有潰爛，倒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奇蹟地完全癒合了，士恆常給人講述此事，並風趣地說：「我在弟兄

⁶ 同上，83~86頁。

之中排行第四，由於庚子年為主致命時，被砍斷了一股筋肉，造成了兩腿長短不一，走起路來好像道路不平，在有些人眼中，我這好似成了短處，因而有些人諷刺地喊我『拐四』或『四拐子』，我竟不以為然，倒是覺得天主常同我在一齊，我爲了天主，聽在耳，忍在心，這也是爲我立功的好機會，我的傷口從砍傷直到痊癒，從來沒有疼過，這難道不是天主常同我在一齊嗎？」士恆常說：「我的傷痊癒後，便到聖堂相幫神父，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生不愛多說話，博得了神父們喜歡和愛戴。後來神父把我介紹到太原郵政局工作。」⁷

（三）瑪利亞方濟各會（FMM）的七位致命修女

山西太原城曾發生三次致命事件，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七位致命修女是在第一次事件 7 月 9 日那天殉道，其中三位是法國人，兩位是意大利人，一位比利時人和一位荷蘭人，死時最大的只有 36 歲，最年輕的是 24 歲。她們是被山西代牧方濟會士聖艾士傑主教（St. Gregorius Grassi, OFM）邀請到太原在孤兒院及診所服務的。1898 年艾主教向修會會祖苦難瑪利亞修女提出邀請。會祖雖然清楚當時中國境內反洋教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但仍答應派遣修女去。當她從修女中選拔出這七位後，她積極準備她們面對這個艱險的傳教使命。她曾將當時兩個月前在中國被殺的傳教士 P. Victorino 神父的屍體照片給她們看，又在她們出發前約一年的時間，把這個團體的成員齊集在法國馬賽，

⁷ 同上，87~88 頁。

使她們一同生活，在她們多元的文化和性格中塑造一個有共同身分，配上生活工作上的訓練，使她們在精神上和能力上準備好面對她們的派遣。

艾士傑主教在 1900 年 7 月初收到外面傳來的消息，已感到風雨欲來，於是齊集這些修女們，叫她們喬裝退避到安全的地方。院長修女們代表向主教說：「可敬的主教，看在天主的愛之份上，請不要阻擋我們與你一起面對死亡。……我們深信：天主既然給了苦難，也一定會給我們足夠的力量去跨越。我們既然不怕折磨也不怕死。我們為愛而來，若需要，我們也會因愛而流盡我們的血，所以不要拿走仁慈至善的天主從高天給我們賜下的棕櫚枝。」⁸ 修女拒絕了主教的提議。7 月 9 日下午四時，督撫毓賢親自帶領一隊官兵到來，先到囚禁基督徒的地方。所有傳教士齊集到主教房內，接受主教給他們的最後降福。他們被帶到督撫衙門，當時已有三千多名義和團民聚集，經毓賢審問兩位主教之後，就下令處斬所有傳教士。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七位修女是一衆人等最後受刑。她們跪著祈禱，互相擁抱，說聲「天上再見」後，分別步上刑場。她們口中唱著讚美天主曲，直到最後一個。這七位殉道修女芳名如下：聖愛敏納修女（S. Erminia di Gesu, FMM, 法國籍）、聖巴溪修女（S. Maria Della Pace di Bolsena, FMM, 意大利籍）、聖嘉納修女（S. Maria Chiara Nanetti, FMM, 意大利籍）、聖雅都斐納修女（S. Maria Adolfina Diericks, FMM, 荷

⁸ “Vie de Marie Hermine de Jesus et de ses Compagnes”, par Marie de la Passion (1902), p.325。參：劉淑珍，《風雨彩虹》，74 頁。

蘭)、聖雅曼定修女(S. Maria Amandina del S. Cuore, FMM, 比利時籍)、聖菊斯德修女(S. Maria di San Giusto, FMM, 法國籍)、聖納達理修女(S. Maria di Santa Natalia, FMM, 法國籍)。⁹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0 年 10 月 1 日在中國聖人列聖典禮中有這樣的講話：

.....今天教會感謝天主，祂以這些中華兒女的聖德光輝，祝福並照耀教會。大禧年不正是光榮他們傑出見證的最適當時辰嗎？那 14 歲的王亞納，不怕逼她背教者的威脅，伸著頭頸，容貌煥發地喊道：『天堂的門為大家打開了。』於是她口中輕輕呼求主耶穌聖名三次。那 18 歲的鄒柱子，已被砍去了右手。劊子手正準備剝他的皮時，他毫無畏懼地呼喊：「我的每一塊肉，每一滴血都要說：我是天主教徒。」其他八十五位不同年紀不同身分的中國男女，有神父、修女和教友。他們也為同樣的信念和喜悅作了見證。他們以捐軀來肯定自己對基督、對教會永恆不變的忠貞。這些事蹟發生在幾個世紀之間，和中國歷史上一些複雜和艱困的時代。現在舉行的禮儀，不是為那些歷史階段作評斷的適當時刻。這樣的評斷可以、也應該在另一個場合進行。今天，教會舉行這個隆重的宣聖大典，目的只在承認那些致命者的勇敢和言行一致，是我們每個人的表率。這對高尚的中華民族，是個榮耀.....¹⁰

⁹ 七位殉道修女的生平可參：劉淑珍，《風雨彩虹》，11~32 頁。

¹⁰ 林瑞琪編，《中華大地的榮耀》，4~5 頁。

隔日（10月2日），教宗對前來羅馬參禮者有以下講話：

首先是對你們——出生在中國的信友們。我分享你們的極大喜樂。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中國人民的子女被推薦給整個教會和全世界，作為基督的傑出忠誠，以及偉大心靈的榜樣。他們是優秀的中國人民的真正光榮。當我想到中國大陸所有的信徒們，想到他們此時此刻，同我們密切結合著，我便覺得格外喜樂。對他們來說，一如對你們一樣，聖人不只是模範，而且是天主面前的情人。我們需要殉道聖人們助佑，因為我們也有本份，懷有像他們當時所表現的那樣的決心和忠誠，來面對我們今日的生活。你們都知道一百二十位殉道聖人中的絕大多數，是在為你們民族有特別意義的歷史時期傾流了熱血，那時期的情況著實悲慘，社會劇烈動盪不安。你們要知道，教會的宣聖，並不意味著對那些時期作出歷史判斷，更無意為某些政府，在那時代給中國歷史塗上污點的時代作出辯護。教會所強調的，是這些可敬的中國子女們的傑出忠誠。他們不被強烈迫害的威脅所嚇倒……¹¹

「我的每一塊肉，每一滴血都要說：我是天主教徒。」這句豪語擲地有聲，可媲美殉道者猶斯定（Justin the Martyr, c.100~165）在羅馬總督魯斯提庫斯（Prefect Junius Rusticus）前大膽的見證「是的，我是基督徒」（Ego ergo sum Christianus）一樣，至今仍在信徒的

¹¹ 同上，7~8頁。

心中迴響不已。

二、聖高比神父 (St. Maximilian Mary Kolbe, 1894~1941)¹²

聖高比神父於 1894 年 1 月 8 日生於波蘭，父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特別敬愛聖母，給他取名為雷蒙高比 (Raymund Kolbe)。1906 年，當他 12 歲時，他的生活受到聖母瑪利亞近乎一個異像的啓示所影響：「那天晚上，我問聖母將來我的生活會是怎樣子的。她便前來，手中拿著兩個皇冠，一個是白色的，一個是紅色的。她問我選哪一個？白色代表我要保持我的貞潔，紅色代表我將會成為殉道者。我說：我兩個都要！」¹³

1907 年，聖高比神父和他的哥哥弗朗西斯加入了方濟會的修道院 (Conventual Franciscan Minor Seminary)。1910 年，聖高比進入初學時，選取了一個聖名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an)。他在 1914 年宣發終身願時，又額外再取多一個聖名瑪利亞 (Mary)。

當 1917 年他還在羅馬學習時，他成立了「無原罪聖母軍隊」(Militia Immaculatae)，目標是希望透過對聖母的敬禮傳播福音。他希望以祈禱來轉化罪人、異端者以及與教會分裂者，把他

¹² 本段主要取材自 John P. Whale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Maxmilian Kolbe, 2002) ; Elaine Murray Stone, *Maximilian Kolbe* (Paulist, 1997) ; Armstrong Regis & Ingrid Peterson, *The Franciscan Tradition*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2010) ; Andre Frossard, *Forget Not Love: The Passion of Maximilian Kolbe*, trans. by Cendrine Fontan (San Francisco: Ignatius, 1991).

¹³ Regis & Peterson, *The Franciscan Tradition*, p. 50.

們奉獻於無原罪聖母。聖高比神父於 1918 年晉鐸，一年後醫生宣布他一邊的肺部已壞死，而另一邊的肺部也嚴重受損。肺病並沒有阻礙他的傳教工作，他於 1927 年在波蘭尼波卡拉努夫（Niepokalanow）建立了「無原罪聖母城」（the City of the Immaculate）作為方濟會院及靈修中心。他出版的刊物名為《無原罪聖母武士》（*Knight of the Immaculate*），到 1939 年其銷售量超過一百萬份。

他 1930 年遠赴亞洲傳教，途經埃及、越南、上海，最後停留在日本長崎，並在那裡建立了「無原罪聖母園」（the Garden of the Immaculate），成立了方濟會團體。直到 1936 年他被召回波蘭參加省級分會，並被任命為「無原罪聖母城」的監護人，從而阻止了他返回日本。兩年後，他在「無原罪聖母城」開設了一個廣播電台（Radio Niepokalanów）。他還持有業餘無線電執照，呼號為 SP3RN。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是為數不多的留在「無原罪聖母城」方濟會士之一，在那裡組織了一家臨時醫院。德軍佔領該鎮後，於 1939 年 9 月 19 日第一次逮捕他，後來於 12 月 8 日獲釋。獲釋後，他獲准繼續出版宗教作品，儘管範圍大大縮小。會院繼續充當出版社，發行了許多反納粹德國的刊物。他繼續在「無原罪聖母城」工作，並和其他會士為難民提供庇護所，包括 2000 名猶太人，他將他們藏在會院中以躲避德國人的迫害。聖高比幾乎包辦所有工作，仍每天早起開彌撒和作默想。他經常分發他製作的「奇蹟勳章」（Miraculous Medal）。曾經有一隊德國士兵駐紮在城中，他甚至也將勳章給予一些德國士兵。他像基督一樣，愛每一個人，無論他們是好是壞。他

從未譴責或判斷過侵略他人領土的納粹侵略者。¹⁴ 雖然如此，他在最後一期《無原罪聖母武士》刊物中有一句話甚為突出：「沒有人能改變真理。我們能夠做或應該做的就是去尋找真理。當我們抓著它後，我們應當為它服務。」¹⁵

聖高比的行動逐漸受到德軍的監視，有會士曾向他乞求：「神父，千萬要小心！如果他們把你逮捕，我們將會怎樣呢？」他回答說：「這算不得什麼，只是轉換了監護人。另一位方濟會士會來負責。」沒多久，一位曾在「無原罪聖母城」內工作的「在俗兄弟」(lay brother) 因私自鑄造假幣而被聖高比驅逐回家。這位兄弟 (Gorgonio Rembicz) 回家後被德軍盤問，最終簽字同意出賣他。1941 年 2 月 17 日早上，五名德軍士兵前來拘捕他時，聖高比從容鎮定對他們說：「願耶穌基督受讚美！」士兵中的領袖問：「你是否是高比？」他回答說：「我就是。」他再次聽到令人膽怯的話：「你要被逮捕。」¹⁶ 他首先囚禁在華沙附近的一座監獄，後來與其他猶太人被遣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 (Auschwitz- 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他的囚犯編號為 16670。

在營中，他每天跟著數百名囚犯前往營地外的田地幹活。他們扛著鋤頭和耙子，從早到晚在一排排莖稈上彎著腰。他們可憐的口糧僅夠養活一個孩子，更不用說做苦工的男人了。他

¹⁴ Elaine M. Stone, *Maximilian Kolbe, Saint of Auschwitz*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7), p.67.

¹⁵ *Idem*, p.69.

¹⁶ *Idem*, p.72.

們早上喝一杯仿製咖啡，回到牢房只有些淡湯和半塊麵包。到了晚上，他不多躺下休息，而是從一個床位走到另一個床位，利用所有機會，偷偷地到每一張床位去探訪，說：「我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有甚麼可以幫忙的？」許多人被即將死亡的想法折磨著，他就帶領祈禱、聽告解、鼓勵在絕望中的人。營裡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祈禱，但他抓住了機會。他在吃微薄的飯菜之前畫上十字聖號。晚上，他跪在床鋪旁邊的地板上為別人祈禱。當他被鞭打時，他從不喊叫。相反，他為折磨他的人祈禱。

有一位倖存者亨利（Henry Sienkiewicz）憶述，有一次他看見聖高比推著滿載重量的獨輪車，他前去幫忙時卻被守衛發現。那守衛於是命令他坐在獨輪車上，以增加聖高比的負荷。聖高比以無比堅韌的力量推到目的地。他不單沒有懇求亨利的幫助和憐憫，反而說：「亨利，不要失去信心。我們每一樣所受的痛苦全為無玷聖母。在這裏我們一定要為傷害我們的人祈禱。」¹⁷

在一個炎熱的夏天，聖高比被鞭打後失去知覺，送進醫院。狄醫生（Dr. Rudolph Diem）本身也是波蘭籍的囚犯，發現他發高燒及肺炎，於是為他治理。狄醫生曾多次看見聖高比在排隊等候見醫生時，總是讓位給那些比他更弱的病者。狄醫生也是信義宗信徒，但看見營中的淒慘情境，信心盡失。有一次他坐近聖高比的病床並問道：「活在這樣的苦難中，目睹了折磨和死亡，你還信神嗎？」生病的聖高比回答：「是的，我信。我把我

¹⁷ *Idem*, p.79.

所有的信德全託付於上主和無玷聖母。或許，我的痛苦會帶來好處。」這位醫生後來在聖高比宜聖的調查過程中作證說：「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在奧斯威辛的四年裡，我從未見過如此崇高的例子，這樣愛天主和愛近人。」¹⁸

最爲人感動的是有一次營中有人逃走了，德軍就抽籤了十個人要送到等死室作爲警告及懲罰。一名畫家（Miescislaw Koscielniak）在聖高比宜聖的調查過程中作證說：

天主的僕人（指聖高比）代替同伴自願死去，即被囚禁的方濟加約尼切克（Francis Gajowniczek），一個家庭的父親。那是在 1941 年 8 月的月初。由於一名囚犯越獄後，長官弗里奇（Lagerführer Fritsch）下令處死十個人作爲報復。我們的營房有守衛拿著自動步槍和警犬看守。弗里奇親自揀選受害者。我在第三排，看得很清楚發生了什麼。弗里奇在某處停下，直指囚犯方濟，他因對死亡感到恐懼，請求寬免。然後從隊伍中走出來一個我認識的囚犯，他是高比神父。天主的僕人走近弗里奇，用德語以平靜的聲音說他願意替代方濟受死。弗里奇被這個天主僕人的動作激怒了，他把手放在左輪手槍上，問道：「你瘋了嗎？」高比神父清楚重複他的要求說，他的生命比起這位男士（所指是方濟）更無用，他是一個家庭的父親。經過短暫的沉默後，弗里奇問天主的僕人：「你的職業是什麼？」神父回答說：「我

¹⁸ *Idem*, pp.79~80.

是天主教神父。」過了一陣沉默之後，弗里奇同意了並將天主的僕人與一群已揀選的死囚送走了，而方濟回到了他的位置。¹⁹

另一位醫生 (Niceto Włodarski) 也在聖高比宜聖的調查過程中作證，內容大致相同，但加添了一些細節：「……方濟 (Francis Gajowniczek) 被抽到後，他明白在他身上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於是在痛苦與絕望中哭泣，他有妻兒，他想再次見到他們。他知道他將要死去。就在這時刻，聖高比神父站到前面，指著方濟，對長官說他願意代替這位囚犯犧牲自己，因他沒有妻子，也沒有兒女……長官問他的職業是什麼。他回答說我是一位天主教神父。」²⁰

聖高比神父環顧黑暗的地下牢房，天花板附近的一扇裝有柵欄的窗戶透出一絲光亮，什麼家具都沒有，只有角落裡放著一個承載糞便的木桶。夜幕降臨，饑餓和乾渴折磨著等死屋的死囚。有些人哭了，一些人祈禱。正在遭受酷刑的人發出尖叫聲和呻吟聲，穿過門口傳來。圍牆另一側的饑餓牢房裡傳來低沉的哭聲。每一天都一樣。沒有食物的死囚被饑餓折磨。有些人喝了自己的尿。其他人則在潮濕的牆壁上才可勉強舔些水分。第四天，第一名受害者逝世。高比神父最後日子鮮為人知。一位名叫般奴 (Bruno Borgowiec) 的工人提供了些許訊息，他的工

¹⁹ Andre Frossard, *Forget Not Love: The Passion of Maximilian Kolbe*, translated by Cendrine Fontan (San Francisco: Ignatius, 1991), p.195.

²⁰ *Idem*, p.197.

作是每天進入牢房搬運屍體。他回憶說：「每次我前去高比神父和他的同伴們的地下牢房時，我聽到對聖母的熱切祈禱和讚美詩的聲音。高比神父開始時還會大聲祈禱，然後其他人會加入。到了第六天，神父已虛弱得無法再唱歌了。其他人一動不動地躺在水泥地板上，但這位神父卻沒有，他仍然為一個一個的受難者低聲祈禱。然而，他臉上卻閃耀著平靜的神情。囚犯死得很快。我每天必須搬走一具屍體。」²¹

1941 年 8 月 14 日，也就是死囚被關在等死屋兩周後，只有四人還活著。指揮官弗里奇需要牢房來關押下一批被判死刑的囚犯。他派營地醫生給垂死的人注射石碳酸以加速他們的死亡。當博克博士 (Dr. Bock) 在聖高比宜聖的調查過程中作證時，他說他帶著致命的注射器進入了黑暗的牢房。在昏暗的燈光下，他看到地板上有三個人不省人事。他在他們的手臂上放了一個橡膠恆溫器，然後插入注射器。幾秒鐘後，三個人都死了。高比神父仍然清醒坐著，靠在牆上。勇敢的神父看著兇手的臉向他微笑，彷彿是在向醫生給予祝福和寬恕他。然後他伸出瘦弱的手臂給醫生注射。那一天，高比神父戴上應許的殉道冠冕。

高比神父的遺體在 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節被運走，他的遺體被扔進奧斯維辛火葬場的火爐中。在高比神父還未被逮捕前，他曾告訴他的會士們：「我死後，我希望我一無所有，希望風能將我遺體的骨灰吹散到全世界。」他的願望實現了。火葬場高

²¹ Elaine M. Stone, *op. cit.*, p.86.

大的煙囪將他的骨灰噴灑在波蘭鄉村。在他毫無怨言地忍受著可怕的饑餓和口渴的兩個星期中，一位親眼目睹這一切的守衛說：「在這裡，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這樣的人。」高比並不是唯一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神父。他只是納粹用毒氣毒死並在烤爐中化爲灰燼的數百萬無辜者中的一員。該地區的農民看到火葬場高大的煙囪日夜冒出濃濃的黑煙。受害者的遺體僅僅剩下一鏟一鏟的骨灰，其中包括在那裡被處死的四百萬猶太人。²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82 年 10 月 10 日冊封高比神父爲聖人；其瞻禮是每年的 8 月 14 日（即聖母升天節的前一天）。他的故事已被拍成電影：Life for Life—Saint Maximilian Kolbe，中譯爲《仁慈之心》。耶穌說：「人若爲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十五 13）。聖高比神父以他的生命和其行動證明了他是耶穌基督真正的跟隨者。

三、反思

在結束這本文之前，筆者有以下幾點反思與各位分享。

（一）背教者與跌倒者多，殉道者和堅守信仰者少

「是的，我是基督徒！」在每次教難中，都可看到有些基督徒爲捍衛信仰，不屈服於外在壓力，甘願獻出生命而爲所信仰的基督作見證，這樣的殉道者（Martyrs）被尊爲信仰的楷模。也有一些人以殉道者的勇氣和精神宣認了信仰，並隨時準備爲

²² Elaine M. Stone, *op. cit.*, pp.86~87.

基督的緣故捨生，但他們並未致死，就被釋放。這些「堅守信仰者」回到昔日的團體後，會很受尊敬，並在教友中產生很大的影響。香港教區的黃勇牧神父曾坐監二十多年（已於2005年逝世），1980年代初從中國被釋放出來回港，講話就很有權威。

當然，教難除了上述兩類人外，還有背教者（Apostate）和跌倒者（Lapsi），這兩類人佔最多數。昇平時，大家一同進堂，一旦遇有打壓和危難時，基本上就會分出這四類人，而後兩類的人居多數。或許我們可從耶穌的撒種比喻中找到一些啓迪。耶穌說：「這比喻的意思是種子是天主的話。那些在路旁的，是指那些人聽了，隨後就有魔鬼來到，從他們心中把那話奪去，使他們不至信從而得救。那些在石頭上的，是指那些人，他們聽的時候，高興地接受那話，但這些人沒有根，暫時相信，一到試探的時候，就退避了。那落在荊棘中的，是指那些聽了的人，還在中途就被掛慮、錢財及生活的逸樂所蒙蔽，沒有結出成熟的果實。那在好地裏的，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誠實的心傾聽的人，他們把這話保存起來，以堅忍結出果實」（路八 11~15）。魔鬼的試探、人生的掛慮、錢財及生活的逸樂，或許就是背教和跌倒的原因。善良、誠實、保存和堅忍結出果實，或許就是戴都良（Tertullian, 155~220）所說「殉道者的血是信仰的種子」（Sanguis Martyrum Semen Christianorum）。

今天別人可否從我們身上看到殉道的精神，端視乎我們如何為信仰「殉道」。我是否準備好做一個真正的殉道者？若有教難，背教的會是我嗎？有人說今天的殉道方式不同，每個人可

以選擇自己的方式。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挑戰，我們的困難不一定來自外教人的壓迫，但實際的挑戰可能比之更大。如隱藏的、秘密的背教者或「內鬼」，他們會讓我們不經意間陷入誘惑。明顯的敵人易防，偽裝的朋友比公開的敵人更危險。我們必須急切裝備好自己的信仰。

（二）「隱藏」的背教者和跌倒者

既然有背教者和跌倒者出現，換句話說，平時他們就「隱藏」起來，不被認出。這兩類人可能來自教會的各個階層，不僅有普通的主日教友，也可能是很積極的熱心信徒，甚至是善會會長、神父、主教；當然，也可能是你或我。問題在於，昇平時代，我們怎樣強化這些「隱藏」者的信德和堅毅。這讓筆者憶起耶穌的比喻，即瑪十三 24-30 莠子與麥子的比喻。這是一項警告：莠子的結局將會是淒慘和毀滅性的。再看看耶穌的門徒猶達斯之結局，我們應當引以為戒。

提及隱藏的背教者和跌倒者，筆者藉用《羅馬帝國興亡史》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的一句話：「繁榮昌盛鬆弛了紀律的神經」（Prosperity had relaxed the nerves of discipline）²³。這句一針見血的話道出教會在昇平時缺乏團體的紀律。筆者在介紹聖西彼廉時，他為我們已指出在迦太基教會內紀律的敗壞已發出惡臭。²⁴

²³ 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93), p.56.

²⁴ 參：拙著，〈敢言說「不」的殉道者〉（上），《神學論集》221期（2024 秋），327~355 頁。

這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今日天主教會中個人和團體信仰生活的紀律。所謂見微知著，怎樣的紀律或許反映背後的精神面貌。

（三）有教難是否更好？

有人認為教難是教會成長的外部動力，沒有困難和挑戰就沒有成長，正如一句外文諺語 No Pain, No Gain。有人說教難是天主的懲戒與警醒教友。昇平時期的俗化及墮落常對教會構成更大的傷害，故此，天主要用某些方法來淨化教會。也有人說教難是化了妝的祝福，這份祝福難能可貴，它宛如十字架的兩面，正面是苦難，背面卻隱藏復活的希望。不論哪種說法，教難可使意志弱小的人變得堅強，也可分辨出信仰的真偽，有助於教會團結一心，起到淨化教會的作用。

香港 1997 年回歸時曾被喻為是一場即將來臨的教難，不少人買了移民保險後不久又回流，因為直至 2019 年，所期望的迫害或教難從未發生。然而，在 2019~2023 這四年內，香港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新香港對不少人已變得陌生，在這種境遇下，有不少人已移民他國，因為他們這次真的擔心，宗教自由已變成一句空話。去與留成為香港基督徒的關切。留下來的人應當如何自處？筆者認為我們應當盡快裝備自己，好能迎接未來的挑戰和危機。不過，令筆者感到錯愕的是有部分教會人士竟不覺危機將至，且自我感覺良好。這又會否是溫水煮蛙的再版？

或許人們常傾向於將危險和不確定性視為生命中的異數，或者傾向將自己放進一個基本上可以掌控的世界，不容某些不

可預測的力量闖入。筆者的觀點恰恰相反：危險和不確定性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個維度。事實上，我的理解是它們使生命變得重要、有意義和價值，同時也點出某人在他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麼。他如何應對危險和不確定性將決定了他作為人的意義。教難將我們丟入不可掌控和不可預測的境遇中，測試基督徒什麼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又考驗他會否讓天主成為他生命的真正主宰。

（四）教難有危也有機

為基督徒，教難本身是一個危機。危，是對信友們的信德產生衝擊，因其殺傷力太猛而使信友喪失信德，成為背教者。機，是教會一個自身反省的好機會，再次認清其本質及身分——在世不屬世、屬天也在地的信仰團體。初期教會在最初的三百多年裡，是在教難中成長的。她不單深知教難的本質，並且找出當中的危與機。究竟她靠什麼力量能在排山倒海的教難下仍屹立不倒？藉著天主聖神加強在殉道者身上的信德，跨越教難。聖若望宗徒曾說過：「得勝世界的勝利武器，就是我們的信德」（若壹五/4b）。

此外，教難也為教會提供一個難得的作證機遇，使不信者及迫害者悔改皈依。正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0 年 10 月 1 日在中國聖人列聖典禮講話中提及：「那些致命者的勇敢和言行一致，是我們每個人的表率」；及在 10 月 2 日講話中提及：「這些可敬的中國子女們的傑出忠誠……不被強烈迫害的威脅所嚇

倒……這對高尚的中華民族，是個榮耀……」。²⁵

（五）居安思危、居危思變

居安思危是歷史對人們的警示，這為教會也不例外。昇平時代，教會常不知不覺放鬆警惕，陷入世俗事務的誘惑。對教會傷害最大的，不是來自外部的力量，而是內部的問題。外部的力量是指教外人迫害教會可能出於恐懼、不理解或個人的私利。教會真正的危機不在這些外部的迫害，而在於內訌、內鬥和內耗（三內）裏面的混亂（例如十五世紀的三位教宗的分裂及十七世紀的中國禮儀之爭）。基督徒的團體，也是人的團體，內部自然也有很大的張力：由於信理，或由於紀律，有時分黨分派，不同觀點僵持不下，對教會造成很大的傷害。相反，當外面有強大的力量迫害時，反倒能增強教會的內聚力和向心力，有助於團結合一。若教會無外在威脅，就較易生內鬥，誠如古人所說，無外患，則有內憂。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72~337）雖為教會帶來宗教自由，但在其任內就使教會內部相鬥，如亞略異端（Arianism）及多納徒派的分裂（Donatist Schism）。和平時代最令人擔憂的是教會紀律的放鬆和懈怠，凝聚力減弱，使得教會信仰失去了原有的見證與吸引力。和平年代看似昇平，但若不居安思危，必會招致更大的災難。居危思變是指面對危機時處變不驚、隨機應變的態度，在當中要有辨別「不可變的要堅持、可變的要變」

²⁵ 林瑞琪編，《中華大地的榮耀》，4~8 頁。

的智慧。正如保祿宗徒所說：「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為使你們能辨別什麼是天主的旨意，什麼是善事，什麼是悅樂天主的事，什麼是成全的事」（羅十二2）。耶穌鼓勵門徒說：「當人把你們交出時，你們不要思慮，怎麼說，或說什麼，因為在那時刻，自會賜給你們應說什麼。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父的聖神在你們內說話」（瑪十19）。

（六）你要作英勇有為的大丈夫！

「你要作英勇有為的大丈夫」是出自列上二 2b。它是達味君王死前囑咐自己的兒子撒羅滿說：「我現在要走世人應走的路，你要作英勇有為的大丈夫。恪守上主你天主的典章，履行他的道路，遵守他的規律、誠命、法令和制度，如梅瑟法律上所記載的：這樣無論你做什麼，無論你往何處去，必然順利；上主也必履行他關於我所說的話，說：如果你的子孫固守他們的道路，真能全心全意在我面前行走，那麼，你的後代就決不缺坐上以色列寶座的人」（列上二 2-4）。作英勇有為的大丈夫這句話正切合殉道者犧牲時當下的無懼和膽量。他們真切地以言以行恪守上主天主的典章，履行他的道路，遵守他的規律、誠命、法令和制度，直至交出自己的生命。

不過，筆者憶起 1988 年香港無線電視劇《當代男兒》的主題曲〈真的漢子〉，由鄭國江填詞，林子祥作曲及主唱。其中部分的歌詞如下：「……做個真的漢子，人終歸總要死一次……人生有特殊意義，能改變我的際遇，能演變動人故事，求獻身維

護正義。」筆者特別喜歡「做個真的漢子」及「求獻身維護正義」這兩句。真的漢子正道出殉道者那份剛毅與勇敢的精神，而真福八端中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正與求獻身維護正義有異曲同工之妙。切望讀者們在信德中堅定不移，在耶穌基督的信仰內作戰，做個真的漢子，互相共勉。